



三希堂法帖

卷一  
翁同龢



卷一

北京日报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 三希堂法帖

卷二  
唐宋元明

## 卷二

北京日报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三希堂法帖

魯公題義

卷三

北京日报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 三希堂法帖

卷四  
启功题跋

## 卷四

北京日报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精刻名迹  
珍品  
書苑  
華夏

華夏書苑



心  
原  
見  
立  
也  
中  
國  
書  
法  
學  
院  
印

初月出天涯

眾星列河漢

三希堂法帖重印取書  
語以示讚歎

趙樸初



古師法去告化用

為

今

用

九三

用

鑑



三希堂始肇  
墨善華萃一堂喜觀  
大成饒舊招銀鈎承  
獨帝宮藏

北京日報出版社新刊三希堂法帖問安  
懷德喜

溥杰



## 序言

《三希堂法帖》全称为《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是十八世纪中叶清乾隆初年宫廷编刻的一部大型丛帖，其规模之大，收罗之广，镌刻之精，以往官私刻帖鲜与伦比。现据乾隆拓本影印，实书苑一宗快事。

集多家法书汇为丛帖，并刻诸木石、广为传拓的做法，约始于北宋刻《淳化阁帖》或更早，延至清代，刻制丛帖之风乃大为兴盛。清代刻帖数字，约相当宋、明的两倍。这一方面反映了由于书法艺术发展的需要，使传统的刻帖艺术得到进一步推广；另方面，清宫廷的大量刻帖，对社会亦不无影响。清廷为镌刻刷拓御笔及敕大臣书写的字帖等，在内务府设有专门机构——御书处，仅康熙至乾隆初年即刻制有《渊鉴斋法帖》《四宜堂法帖》《敬胜斋法帖》《三希堂法帖》《墨妙轩法帖》等七十多种。此后，至乾隆末年止，又继续刻有《兰亭八柱帖》《重刻淳化阁帖》，御制各种诗文及命大臣等书写的节日联句诗帖等一百多种，并常以此赐王公大臣。于是在《三希堂法帖》刻成后，私家刻帖也相继发展起来，甚至到乾隆末年，竟出现了钱泳这样的一生摹了数十部碑帖的刻帖大家。刻帖的发展，使历史上各家法书特别是行草书得到相当程度的普及，对当时书法艺术的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而《三希堂法帖》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应有的促进作用。

乾隆皇帝弘历是一个喜爱诗文书画的人，为了显示自己博雅，常暗与当代文人和历代帝王争奇斗胜。从传世清内府收藏的书画上乾隆题跋之多，各名胜古迹乾隆御笔铭刻之滥，从《敬胜斋法帖》后半部所刻弘历对历代法书临摹之广，均可看出他对书法艺术是如何倾心。他的书画活动，早在做皇子时即已开始，在命编《石渠宝笈》谕中曾说，「朕少年时间，涉猎书绘，登极后，每缘几暇，结习未忘，弄翰抒毫，动成卷帙」，当是可信的自述。《三希堂法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三希堂，地点在故宫西路养心殿内，是从养心殿西暖阁隔出来的一个小小的雅室，面积不过数平方米。据了解，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弘历在三希堂内自书《三希堂记》云：「内府秘笈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帖》，近又得王珣《伯远帖》，皆希世之珍也。因就养心殿温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这就是三希堂命名的开始。《三希堂记》中还谈到「三希」的另外两个含义：「则吾今之名此堂，谓之为希贤、希圣、希天之意，可；慕闻之先生之二希，而欲希闻之之希，亦可；即谓之王氏之帖诚三希也，亦可。」但很显然，前二者并非原意。

《石渠宝笈》是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年）弘历命内直诸臣将内府所藏书画「详加辨白，遴其佳者，荟萃成编」的一部书画精品目录。《三希堂法帖》所收各家法书，即从编入《石渠宝笈》的珍品中选出的，故称《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基于对书法的留意，弘历于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腊月发出编刻《三希堂法帖》的特谕。谕中说：「我朝秘府，初不以广购博收为尚，而法书真迹，积久颇富，朕曾命儒臣详慎审定，编为《石渠宝笈》一书。因思文人学士得佳迹数种，即摹入

石，矜为珍玩。今取群玉之秘，寿之贞珉，足为墨宝大观，以公天下。」因此，命当时的户部尚书梁诗正、军机大臣汪由敦、吏部侍郎蒋溥等，从编入《石渠宝笈》的历代法书中，「择其尤者，编次欵勒」。据档案记载，刻制此帖的进程是：从弘历下令镌刻《三希堂法帖》后，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懋勤殿交出编次、钩摹好的《三希堂法帖》的底本——油条（即用油川连纸钩摹好的字）三十二册。又钩摹了一份副本，然后钉朱刻石的。懋勤殿，在故宫中路乾清宫西庑，是内廷翰林侍值的处所。从原本上向下钩摹的工作，在懋勤殿进行，而且连当时总理镌刻《三希堂法帖》的和亲王弘昼，对原本都「未敢擅请」，可见钩摹之事绝非普通匠役所为。刻帖用的石料是「艾叶青」石。此类石料产于北京房山县境，质地坚硬细腻，与汉白玉性质相同，只微带有类似艾叶的蓝灰色纹理，因而得名。档案中还谈到参与《三希堂法帖》写签、校对工作的，还有内阁学士董邦达，郎中戴临等人，这是弘历特谕中没有提到的。

关于这套丛帖的完工时间，一般以为是嵇璜等人作跋的乾隆十五年。但档案证明不是这年。准确的记载目前尚未发现，但从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总管内务府审查御书处贪污案件的档案中，可以反映出乾隆十八年三月间尚未完工。另从乾隆十八年四月初一日，海望等人为在北海白塔山西面添建围楼（即收藏《三希堂法帖》刻石的阅古楼，未命名前称围楼）及其它建筑物请银两的奏折，及同年八月初六日请银两的奏折中看出，嵌安《三希堂法帖》刻石的阅古楼，始建于乾隆十八年四月以后。八月初六日的奏折中，还报了开解二百三十八块刻石（在镌刻时有的是两块或三块连在一起）的工程费。另一件档案中还记载有同年九月开解各处墨刻石料共用宝砂（约类似现在的金钢砂）二千五百斤。从这些线索中看，《三希堂法帖》刻完的时间，当在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八月前后，阅古楼建筑及嵌安刻石工程，约完成于年底以前。另见历年所存墨刻的档案中有「乾隆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交出《三希堂法帖》卷五十二份，每份三十二卷」的记录。这可能是此帖刻成并嵌安在阅古楼以后第一批交出的拓本。

《三希堂法帖》及阅古楼的工程告竣后，弘历曾多次来此游赏，并有题诗，其中乾隆二十五年《题阅古楼》诗曰：「壁勒千年字，架藏四部书。每因暇来憩，欣与古相干。翰墨漱芳润，云烟幻卷舒。欲询陆司马，所阅竟何如？」

《三希堂法帖》刻成后，弘历发现还有些佳帖未被选入，复于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又命蒋溥、汪由敦、嵇璜等人从内府所藏法书中选出唐、宋、元三朝，褚遂良等十六人的楷、行、草书三十八件，编为《墨妙轩法帖》，以为《三希堂法帖》之续帖，嵌于清漪园内惠山园之墨妙轩（今颐和园内谐趣园之涵远堂）两壁。原石已毁于一八六〇年英法侵略军之手，拓本亦极为少见。至乾隆五十七年，弘历鉴别出《三希堂法帖》中，赵孟頫书《卫宜人墓志》是伪品，遂对此件作了一段识语，并命彭元瑞书，刻之于卷末。此段识语补刻于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九秋或稍后，因此可知有识语的拓本皆为乾隆五十七年以后所拓。

关于《三希堂法帖》历次传拓、赏赐的记载，不仅有关著录中甚为少见，档案资料亦残缺不全。现存乾隆二十一年的《现存书籍墨刻路线图底档》中记有「《三希堂法帖》五十三份，每份三十二卷」。此记比乾隆十九年正月交出的五十二份多一份，可能是笔误。在乾隆五十年《懋勤殿墨刻》档中记有这年十二月初七日「奏明现存帖」中，有「《三希堂法帖》一份，三

十二册，「三希堂法帖」四十七份，每份三十二卷。」此时已是册、卷并用。至嘉庆四年嘉庆帝亲政后的《懋勤殿墨刻》档中记五月二十八日查明呈览墨刻内，仍是「《三希堂法帖》一份，三十二册，《三希堂法帖》四十七份，每份三十二卷」。但这是懋勤殿收、用、存的记录，而不是全部记录。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多套《三希堂法帖》中，就有既刻有王子题识又钤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古希天子」「八征耄念之宝」等多方宝玺的拓本。

档案中还记载嘉庆六年对阅古楼及刻石的嵌安曾做过修缮。并有嘉庆二十年十月十六日刷拓收拾阅古楼等处墨刻石的呈稿。呈稿内记此次收拾刷拓（石面上涂墨）用料为定粉、生黄蜡、广胶、白矾、碱、三草墨等，共用一百六十五工，历时十九天。

关于刻石周围加刻花边的时间，很多有关的著录未记载，欧阳辅的著作中提到系道光初所加，但未提出根据，也无准确时间。一九七八年从档案中查出了时间依据：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清廷对阅古楼及《三希堂法帖》刻石进行过一次大的修整。从四月底到十一月初，历时半年之久。此次整修曾把所有刻石拆下运到远处，将二寸及二寸以下的小字和印章全部进行了剔刻，在剔刻过程中，加刻了花边。加刻花边的原因，可能与改变原来刻石的编号有关。从刻石现有痕迹上观察，原来的编号，每块刻石上为「三希堂某卷某页」，刻花边时，则另按《千字文》的字序「天、地、元、黄……」编号，以隶书刻于每石右下角花边内。原来刻有弘历书写的第一块刻石《特谕》及帖后「烟云尽态」、《阅古楼诗》二块刻石原亦未编入号内，而在花边上的《千字文》字序即完全编入。可能原来认为皇帝所书的三块并非帖的正文，故未敢编号。因此早期拓本也只拓了帖首《特谕》一块，帖尾的两块，则均未拓入。《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释文》亦无后两块的释文，估计弘历书最后两块刻石可能稍后数月，因为《刻石粘宝》档案中记「烟云尽态」为乾隆十九年所刻，《阅古楼诗》署为「乾隆甲戌（十九年）春，御题」。故可能稍后，但又不会相距甚远，因为在乾隆十八年八月工程将完的奏折中，明显记有「嵌安三希堂墨刻石四百九十五块」，与现存刻石数字完全一致，弘历所书三块刻石是包括在四百九十五块之内的。当时可能是先计划好有此两块刻石，由于弘历未及时写出底本，又于十九年春补齐。其中「烟云尽态」之题字，还可能同样做有两块，一块悬于阅古楼后八角石柱亭上，一块嵌于帖后。目前所见带有花边或切去花边的拓本，据闻多系辛亥革命以后所拓，不及初拓珍贵，但也可见其大概面目。

《三希堂法帖》问世以后，深受人们珍视，且至今不衰，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此帖取材丰富。当时清朝宫廷正处在兴旺时期，皇帝恃其封建特权，通过纳贡、抄家等种种方式，将天下名家法书收罗殆尽，内府收藏盈千累万，在此条件下选编出来的丛帖，自然是众多珍品中之珍品，此为任何私家刻帖所难于做到的。此帖共收集魏晋至明末的一百三十五家的三百四十件（此系按《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释文》目录补以明显的漏、错而计出的件数）楷、行、草书作品，另有题跋二百多件，印章一千六百多方，共九万多字，可谓洋洋大观。

再是此帖所用原本，除所谓王献之的《保母帖》和赵孟頫的《兰亭序跋》前的《兰亭序》系据拓本上石外，其余均据内府所藏墨迹，由高手钩摹上石，确实具有较高的水平。其中被弘历誉为三希的《快雪时晴帖》，早在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中

即有记载。据宋代米芾《书史》记载，当时已有三本，此帖可能为唐代摹本。存世此本，曾入宋元秘府，明末清初时归大学士冯铨，冯曾刻人其《快雪堂法书》从帖中。康熙十八年八月十八日，冯铨之子国子监祭酒冯源济将其献入清内府。《快雪时晴帖》虽系摹本，但从这短短的二十四个字中可以看出王字的遒劲秀美，结体均匀，气势贯通，筋骨血肉均恰到好处的特点，故受到历代书法家的重视，一直被认为是王羲之典型书法之一。弘历对此帖亦推崇备至，认为是：「天下无双，古今鲜对」，「神乎技矣」。他历年在此帖上题字达七十多处，并亲自作画，直到八十六岁传位以后，还在帖上题了一条：「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关于《中秋帖》，在米芾《书史》中，有王献之《十二月帖》的记载，因原帖在「中秋」之前尚有「十二月割至否」六字，故名《十二月帖》，以下各字大部份相同，中间亦有数字不同。故书法界多认为此帖系宋临本。米芾认为《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现观此帖虽非原本，但米芾所述之特点仍然具备，亦可资欣赏和参考。王珣《伯远帖》，《宣和书谱》等书中有记载，后来几部丛帖中亦有摹刻，乾隆十一年始入清内府，是传世晋人法书墨迹中，迄今未提出异议的一件。字体遒劲而秀丽，略存汉魏遗意，与王羲之书法不同，但又有某些相通之处。从此帖的点画转折及结体上，可以窥见晋人书风的真实面目。《伯远帖》与《中秋帖》，于清亡后，由晋贵妃售与私人，后抵押于香港某银行，周总理得知后，以重金赎回，现存故宫博物院。

帖中所收唐代的作品，有些也是传世唐代书法墨迹的精华。如欧阳询的《卜商》、《张翰》二帖，字中虽无名款，但从其用笔凝重严谨，字体瘦硬挺拔等特点来看，宋《宣和书谱》将其列为欧阳询书是有道理的。帖中据传世墨迹刻入了两件唐人摹《兰亭序》，传一为褚临，一为冯摹（即神龙本），皆为希世之精品，这两件《兰亭序》有可能是真迹的第一、第二代的摹本。帖中第四册所刻唐孙虔礼的《书谱》，是书法史上的一件重宝，因为它既是一件贵重的书法作品，又是一部杰出的书法理论著作，可以从书法理论与作品的结合上来研究和欣赏。第五册所收唐柳公权书中，第一件《姨母帖》可能是最接近王羲之早期书法面貌的作品，是研究王羲之如何从魏晋原来书风中演化出来的重要资料。

宋朝是我国书法艺术相当发达的时期，传世作品也较多，其中被称为宋四家的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特别是后三家在书法上都有所创新，自成一家，对后世影响很大。《三希堂法帖》在编选时对宋四家甚为重视，所收作品既多，而且把每人都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有选入。如蔡襄的《陶生帖》、苏轼的《黄州寒食帖》、黄庭坚的《松风阁》、米芾的《苕溪诗》等，都是他们的优秀作品。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作品，帖中收刻甚多，他的《纨扇赋》、《道场山诗》以及书札等，无不是赵书的上品。

明代初期，被永乐皇帝誉为「我朝王羲之」的沈度的《四箴》，其子沈藻的《橘颂》，都是当时楷书的典范。从他们的书法可以看出，明清「馆阁体」的书风当时已初步形成。明代中叶书画家文征明的《与野亭札》、《与希古札》也都是他的佳作。明末书画家董其昌的书法，对明末清初影响很大，帖中收刻他的作品占了很多篇幅（共四册），其中《邵康节自著无名公传》，小楷《曹娥碑》，大字行书《倪宽传赞》等，都是董其昌有代表性的作品。

帖中很多珍品的原件已经散佚，唯有《三希堂法帖》中保存着仅有的遗迹，这也是《三希堂法帖》的一大功绩。

《三希堂法帖》的镌刻者，帖尾署名为宋璋等四人（事迹无考）。实际镌刻者当是由御书处刻字人和外雇刻字人等集体完成。其镌刻水平在当时也可列为第一流，所刻不仅字字传神，而且连浓墨、渴笔等特殊效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可谓「仅下真迹一等」。

此帖乾隆时期的拓本，拓工甚为精湛。当时均采用浓墨乌金拓法，字口清晰，稍瘦而富有神韵，每石周围没有花边。传拓用料，均为宫廷特制的「三草墨」和清水连四纸。三草墨系由御书处墨作制造，其用料为桐油、猪油、猪胆、灯草、紫草、排草、广胶、松香，再加冰片、麝香等香料合成，故官所藏乾隆拓本，至今仍乌黑光亮，神彩夺目，开卷生香。

《三希堂法帖》所以博得人们的赏识，还有另外原因，即帖内所收法书，不仅包括很多著名书法家的作品，而且有不少是历史名人、学者的手迹。这些人其他方面的声望人们早已熟知，但其笔迹则于此处所仅见。如唐宋八大家中的苏洵、苏辙、欧阳修、曾巩，史学家司马光，南宋诗人陆游，哲学家兼教育家朱熹，词人周邦彦、叶梦得等等，至于任过宰相或其他高级官员的则更多。这些，均可以玩味其书法的不同风格而引人人胜。

《三希堂法帖》刻成传出后，对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直至现在影印出版此帖，仍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此帖好的拓本几乎不可再得，原刻石至少有九块已严重风化，字迹大部漫漶，早期印本亦不见坊肆。现据乾隆拓本按字体原大影印，将为广大书法爱好者进行研究、鉴赏、临摹提供有利条件。此帖各家作品系按历史顺序排列，最便于从发展中观察、研究魏晋至明一千余年楷行草书的演变，各时代的风貌以及各流派的产生、特点和影响。这些，不仅对中华民族特有的书法艺术的普及、提高有直接意义，而且对丰富人民高尚的文化艺术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当然《三希堂法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如限于当时的鉴定水平选进了部份赝品；由于受刻石统一高度的限制，在没有放大和缩小技术的条件下，对有些原帖不得不作移行、挪位的处理等，都是不容讳言的。对一件历史上的艺术品，可不必求全责备，更不必因其短而舍其长，利用时注意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就是了。

## 万 依 一九八三年七月写于故宫博物院研究室

# 目 录 （卷一）

序 言	(一—五)
清乾隆皇帝弘历特谕	(一—六)
第一册 魏 钟 縣	
晋 王羲之	荐季直表 (三一八)
晋 王献之	快雪时晴帖 (九一六六)
晋 王珣	袁生帖 秋月帖 都下帖 二谢帖 曹娥碑 (传) 行穰帖 游目帖 瞻近帖 (六七一—〇一)
晋 王珣	中秋帖 送梨帖 新埭帖 保母帖 (一〇二十一三一)
伯远帖	(一三二十一三八)
第三册 梁 武 帝 (萧衍) 异趣帖	(一三九一—四四)
梁 无名氏	出师颂 (一四五一—四八)
唐 欧阳询	卜商帖 张翰帖 (一四八一—五四)
褚遂良	倪宽赞 临兰亭序 (传) (一五四一—七七)
冯承素	临兰亭序 (传) (一七七一—八七)
颜真卿	自书告身 朱巨川告 江外帖 (一八七一—三一)
第四册 唐 孙虔礼	书谱卷上 (一一三二—一一五)

第五册	唐	释怀素	论书帖	（三）一六一三三二一
		柳公权	蒙诏帖（传）	（三）二二一三二六
		无名氏	临右军东方先生画赞	（三）一七一三三六
		无名氏	枕王氏万岁通天帖	（三）三六一三六三
	五代	杨凝式	夏热帖 韭花帖	（三六三一三八〇）
第六册		宋 太宗	（赵炅）敕蔡行	（三八一一四一二）
第七册	宋 高宗	（赵构） 千字文 洛神赋	（四一三一四五三）	
	孝宗	（赵构）付岳飞 养生论 书苏轼诗	（四五四一五〇七）	
	李建中	同年帖 土母帖	（五〇七一五一二）	
第八册	宋 叶清臣	近遣帖	（五一三一五二五）	
	韩 琦	谢欧阳公帖	（五二一八一五三五）	
	范仲淹	道服赞 与秀才帖	（五三六一五五六）	
	富 弼	与君謨帖	（五五六一五五九）	
	文彦博	得报帖	（五五九一五六二）	
	欧阳修	与端明帖 与元珍帖 修史二帖	（五六二一五七二）	
三希堂法帖说明与书法家小传（卷一）				（一一二）